

# 以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破解普世价值论的幻象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思想,这是我们破除普世价值论幻象的理论依据。普世价值论和普世价值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不是要一般性地反对普世价值,而是反对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论。普世价值论是一种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和霸权主义掩饰、服务和辩护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主要是恶意误读中国的发展进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放大矛盾并制造事端,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普世价值论之所以在中国蔓延,有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基础变化、思想鉴别能力弱化和学术话语照搬等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普世价值思想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6)03-0001-09

学界关于普世价值论的争论已经有些年头,但是争论的热度却一直没有减弱。一方面,中央高层和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反对普世价值论,主流思想理论界的学者也发表了大量文章,力图抑制和消除其影响。另一方面,倡导普世价值论的人总在特定时期围绕着特定主题不断掀起新的争论<sup>①</sup>。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普世价值论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同普世价值究竟是不是一个东西?反普世价值论者与普世价值论者是否在同一问题域中进行争论?反普世价值论者究竟是在同谁在论争,赞同普世价值者是否都是普世价值论者?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潮何以在本土扎根并不断蔓延,主流思想理论界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反对普世价值论,反对普世价值论的理论标杆究竟是什么?

## 一、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思想

价值关系是人类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以主体为核心的多重关系。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着重探讨客体是什么的问题,是主体对客体的事实性确认即获得真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着重探讨客体的属性对主体的效用以及主体对这种效用的评价和选择。主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侧重于主体出于对客体实然状态的不满而进行的改造,使之达到主体希望的应然状态。这三种关系在人类的现实性生存中是一体化的,确认、评估、改造构成了一个以主体性实践为轴心的连续性过程。

价值关系是具体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据主客体在不同层面上的区分,价值关系可以体现为人与物、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特定评价与选择关系。当人类面对自然时,自然就成为作为主体的人类的客体,人类会对自然的不同属性、特征、效用做出评估,以决定自己对于自然的处理方式。当个人面对社会时,作为主体的个人就把社会及其构成物作为客体,对社会给自己带来的效应做出评估,例如社会是否合理、是否公平等。当一个群体作为主体面对作为客体的另一个社会群体时,也会对另一个群体做出评价和选择。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就存在这样的价值判断: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剥削者,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需要打破和超越的暂时性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则把自己看作是施恩者,是他们

收稿日期:2016-0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5MZD048)

作者简介:金民卿(1967—),男,河南洛阳人,研究员,博士,从事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sup>①</sup>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专门设有“普世价值”专题,收录了有关普世价值讨论中的各种代表性观点的文章。本文参考了该专题下的大部分文章,文中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全部列出。

养活了工人阶级,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不可以超越的、永恒的、最高的阶段。这就是说,价值关系总是具体性的,离开了特定的主体与客体,价值关系就无从谈起,抽象地、空泛地讨论价值关系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假设一种抽象普遍性的价值关系。

由此,当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主体共同体面对共同客体时,就出现一些共同性、普遍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这也就是人们一直以来关注和讨论普遍性价值问题的现实基础。在人类文明的总体系统中,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一些普遍性、全人类性的价值理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仁义兼爱、和而不同等;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印度文化中的众生平等、和平追求等。这些价值追求的表述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但是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理想。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存在着一些超越民族国家和阶级界限的人类共同利益,如安全、生态、环境、能源、人口、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就需要全球人类共同去面对和解决,它们体现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指向和普遍性的价值诉求。当今许多学者关注和赞同“普世价值”,一些国际组织也曾就普遍价值进行过讨论,应该说不是没有依据的。至于说到在处理这些共同问题时的国家民族特别是不同阶级的具体性诉求和立场,那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由此,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普世价值是有问题的,正好被普世价值论者所利用并进行反击。

在关于普世价值论的争论中,一些反对普世价值论的学者为了设定论辩界限的需要,非常认真地对普遍性价值、共同性价值、普适性价值、普世性价值等进行了梳理和区分<sup>①</sup>。这些区分在特定论辩的范围内具有特殊针对性,很有必要。但是,往往是论辩的另一方即普世价值论者根本就不接题,他们从来不去辨析这些概念,而是始终坚守和推广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就使得这种设定失去了其应有的必要性。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区分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设限,失去了共识性意义。通观这些概念在使用的过程中,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支持普世价值的学者还是不支持普世价值的学者,不论普世价值论者还是反对普世价值论者,都把它们指称为全人类性的、共同性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理想。当然,各自所指认的价值的究竟是什么,则是另一个层面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与其在这些概念上做游戏,倒不如直接切题,就把这些具有相同指称的术语统一化为“普世价值”,论者可以在同一个问题域中展开讨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否认“普世价值”——人类的共同性、普遍性、长期性的价值理想,而且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价值理想的问题才真正进入到科学的层面上加以讨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同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标志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之宏大叙事的理论框架,使人类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客体与主体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关于“有用价值”、“使用价值”、“具体价值”、“物的有用性”的多方面分析,在哲学层面上立足于主客体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关于价值问题分析的理论框架。例如,他指出:“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sup>[1]</sup>;“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的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sup>[2]</sup>;商品首先作为人之外的、对人有使用价值的、具体的有用物而存在,“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探索并创造获取对象物的有用性的方式的过程<sup>[3]</sup>,也就是物质生产资料生产的过程,等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他关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规定的核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关于价值理论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的思想,其中关于人类共同理想和价值诉求的思想闪烁着人类性光辉和真理性亮点。从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就谋求建立人与人、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美好的关系,追寻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共同愿望的关系状态,其实践指向就是要依靠无产阶级打碎捆绑在人类身上的物质和精神枷锁,最终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特征的共产主义。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把目标设定在“人类解放”,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指向的“政治解放”之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明确提出,新哲学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来“改造世界”,而不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仅仅“解释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从人类自由发展的角度,以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前景做了展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系

<sup>①</sup>李慎明.“普世价值”只是一个幻想(载中国教育报 2010 年 4 月 12 日)一文以及他的很多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文,就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统阐述了“世界历史”思想,不仅前瞻性地预言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化情景,更重要的是探索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远景;特别是以历史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为依据,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目标,从两个尺度的统一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做了科学阐述。在《1857年-1858年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标尺,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科学阐述了人类自由进步的普遍性规律,从价值与规律相结合的角度对历史发展进行了宏观分析<sup>[4]</sup>。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文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了人类社会治理、民主发展的途径和进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等,把理想性与现实性、价值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有机结合起来,是对人类自由民主发展和政治制度建构的创造性探索。这一切思想观点对于我们正确看待普世价值的问题,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普世价值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有着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辩护理论不同的鲜明特征:一是科学性。它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根据某种假设的前提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打破了抽象的、永恒的意识形态幻象。二是全人类性。它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sup>[5]</sup>即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立场,打破了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追求和其他各种阶级的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阶级,不仅消灭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自身,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全人类的立场,共产主义就是要达到人类的高度自主自觉,个人独立性与社会总体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想。三是实践性。它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和社会实践,共产主义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通过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控诉而假设出来的一种空想,不是思想家通过逻辑推演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设计,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人类解放实践最终才能实现。四是批判性。它立足于对以往文明中关于共同理想的积极性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吸收了以前各种普世价值理论的有效成分,同时对各种虚假的普世价值幻象做了深入的批判,是在同各种剥削阶级的价值观特别是在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斗争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特别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资产阶级平等自由人权的伪

善性、伪人类性。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价值论和普世价值思想。但是,理论界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发掘和整理工作并没有全面展开。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思想,但是这个工作并不顺利,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取得共识,甚至遭遇了很大的理论合法性的质疑<sup>①</sup>。当前,关于普世价值论的论战中,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论时,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当然也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关。关于马克思主义运用问题,列宁曾经说过:随着具体的政治形势和直接行动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sup>[6]</sup>。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是作为指导思想而不是作为一般性的学术理论,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是为了学术研究<sup>②</sup>。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中国现实需要最直接相关的核心观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成为关注和运用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富民强国、发展经济,为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等理论成为关注的焦点。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则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

时至今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人民不仅要满足于物质需要和一般性的文化需要,价值方面的需要日益突出,对社会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诉求日益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发掘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思想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任务了。

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特别是其普世价值思想,缺乏足够的把握和思想储备,产生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论思潮进入中国后,引起了很大的话语冲击力,而马克思主义学界则显得有些仓促应付之感。

<sup>①</sup>李德顺. 价值论研究的几个疑点辨析.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以及《新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对此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和说明。

<sup>②</sup>对此问题,笔者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的导论,第7-8章中,结合青年毛泽东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专门有过阐述。

为此,应该深入发掘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建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普世价值理论。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建构,在批判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时,就有了自己的领地,有了自己的理论标杆,获得了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话语权。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正是通过建立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对旧哲学的批判才真正实现;正是通过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才真正彻底;正是通过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才更加深刻。如果我们一味地拒绝普世价值,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拒绝建立自己关于普世价值的科学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种缺乏顶层设计和战略意义的“还击”。

## 二、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普世价值本身而在于关于普世价值的观念

在反对普世价值论的争论中,存在着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反对普世价值论的学者(“反普者”),在反对普世价值论时断言根本不存在普世价值,进而反对所有赞同普世价值的人——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是普世价值论者(“普论者”),大多数人只是一般性地在学术上赞同有普世价值的学者(“赞普者”)。“反普者”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依据,认为当今世界还处在一个阶级尚未消失的时代,人类依然划分为不同阶级,因此不存在超越阶级的人类统一性和共同体,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普适的、世界性的价值追求,所有的价值追求都是阶级性的、具体性的<sup>①</sup>。进而,凡是赞同和主张存在普世价值的人,就是为特定阶级利益和立场辩护,或者是被特定阶级的价值观所蒙蔽的。应该说,这种论证不论在理论依据还是在现实依据上,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打破“普论者”所宣称的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幻象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这种论断被推向极端之后,就出现了几个不能不加以探讨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对普世价值论的本质的揭示和批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于普世价值论的批判陷入了困境。

第一个问题是,把一般的主张存在普世价值的“赞普者”同坚持和宣扬西方化普世价值论的“普论者”都加以批判,混淆了针对的对象。客观地说,绝大多数“赞普者”同“普论者”是不同的,他们只是在学术上、在认识论上赞同存在有普世价值,而并不支持普世价值论的意识形态主张;他们在政治立场上

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而不是像普世价值论者那样旨在反对和颠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对于普世价值的分析,只是学术范围内的讨论,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性的问题。但是,“反普者”把“赞普者”都看作是“普论者”或受到了“普论者”的蒙蔽,都作为批评的对象。结果,“反普者”不得不在两个方面开战:一方面要批判真正的“普论者”,批判普世价值论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危害;另一方面又要同一般的“赞普者”争辩,在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这个问题上长期纠缠。这就扩大了自己的对立面,造成了“四面出击”的局面,不仅减弱了对真正对手批判的力度,而且失去了学术和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并使自己的批判合法性在学术上遭到了绝大多数“赞普者”的质疑,甚至成为“学术上的少数”<sup>②</sup>,而真正的“普论者”则坐观本无立场分歧而只是学术观点不同的学者之间进行论战而坐收渔利。

第二个问题是,把作为客观存在的普世价值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西方化普世价值论都加以否定,模糊了思想批判的实质。一般性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反映了人们共同性的价值理想、普遍性的价值追求,这是一个事实性的问题。而普世价值论则是一个站在特殊阶级立场、维护特殊集团利益、为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政治观念性的问题。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混淆,给反对普世价值论的思想斗争带来了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困境和尴尬。因为一般性地反对全人类性的、共同的、普世的价值追求,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往往难以理清。普世价值论者恰恰就是把这些作为反攻的武器,企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种反攻并不是没有效果的:“反普者”往往在反击面前,一方面努力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共同价值观不是“普世价值”<sup>③</sup>;另一方面,少数“反普者”甚至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纳了民主、平等、自由这些价值观“出了问题”,应该更加准确地概括核心价值观。这正中普世价值论者的

<sup>①</sup>这个方面,周新城先生的《关于“普世价值”问题需要搞清楚的几个观点》(《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3期)很有代表性;李慎明先生、李崇富先生等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sup>②</sup>侯惠勤先生在《以真理打破幻想——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普世价值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9年3月31日)以及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合法性质疑”、“学术上的少数”等问题,反映了批判普世价值论中的一些困境。

<sup>③</sup>例如汪亭友在《“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载《红旗文稿》2016年第4期)等文中,就花了很大的工夫来做这个辨析工作。

下怀：“反普者”在辩解这些概念时往往已经离开了问题的实质和斗争的焦点——揭露和批判普世价值论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严重危害。

第三个问题是，把关于普世价值的学术争论同关于普世价值论的政治论战加以混同，模糊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是否真正存在普世价值，赞同还是不赞同普世价值，这些都是学术性领域的问题，是学术层面上的讨论，是一个可以进行展开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普世价值论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为着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已经蔓延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指向性的思潮，特别是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指手画脚，乃至对某些政治实践推波助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性的问题，必须要坚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加以批判和反驳。学术范围内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只有把学术讨论活跃起来，才能真正看清楚普世价值论的政治性面目。

其实，问题的焦点根本不在普世价值本身，不在于是否有普世价值，或者是否赞同普世价值。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历史观为依据，站在什么角度、什么立场、谁的利益上来看待普世价值，把什么东西看作普世价值，抱着什么样的动机来宣扬普世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坚持什么样的普世价值观。批判的对象应该是作为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论，而不应该是普世价值本身，应该是那些以特殊的政治目的宣扬普世价值论的人，而不是一般性地赞同普世价值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文化发展的“双百方针”，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发扬学术民主的传统，尊重学者的独立和尊严；另一方面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斗争的策略，汲取历史上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教训，团结和集中广大知识分子的智慧，集中力量批判和反对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性思潮及其代表。

### 三、西方化普世价值论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显然，普世价值和普世价值论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一种价值关系，后者则是一种关于普世价值的观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般性地反对普世价值，而是要反对和批判作为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论。那么这种普世价值论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何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界乃至意识形态部门大加批判呢？

不能否认，普世价值论的话语体系中，有一系列让所有人都向往和倾慕的价值关系和美好理想，诸如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博爱等，它们构成了普世价值论的核心理念和行动纲领。这些富有诱惑

力的价值关系和社会存在状态，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过程中一直追求的东西。普世价值论者正是随时随处高扬民主、反对独裁，高扬自由、反对专制，提倡维护人权、反对践踏人权，支持社会公平正义、反对种族歧视和群体区隔等。表面上看，普世价值论的这种宣称和主张，是一种对全人类共识的价值的追求，是一种先进文化思想理论的普及，反对世界存在的与这些价值理想相违背的现状，引领世界走向一种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人性的价值理想，促进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sup>[7]</sup>他在《资本论》中又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sup>[8]</sup>这应该是我们判断和认识普世价值论的方法论依据，我们不要仅仅看它说了什么，关键是要透过它表面的话语看它做了什么，特别是要看到它造成的后果是什么，由此来追索它的实质。

利比亚战争之前，一些国家和组织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声称要把这个国家的人民从专制独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摆脱独裁专制的压迫，结果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惨死在入侵者的炮火之下，“被解放”的人民却长期陷入内战和恐怖主义漩涡当中，成为当今欧洲难民潮的重要来源地之一。高举普世价值论旗帜的国家在当今世界造成的这种人类灾难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普世价值论的实践和结果充分展示了它的思想逻辑：首先，它立足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治理实践，从资产阶级历史文化中继承了一系列当年曾经发生过积极作用的概念和术语，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正义、进步等，提炼出以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向性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这里，表面性的术语、概念依然那些积极性的、反映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但是实际上是普遍性和特殊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物，既有人类性的共同愿望同时也内含着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诉求。

其次，他们抽去了这些价值观的具体性内涵，抽去阶级社会中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利益性和政治倾向性，而只强调其普遍性指向，突出人们对它们的共同追求；把某些西方国家所主张的、具有地方性特点的自由、民主、人权、进步等思想，夸大成为世界普遍性的思想，把某些西方国家的、具有他们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夸大为全球普遍适用的制度和治理模式，掩盖其中的社会制度特点而突出其

全人类性理想。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幻化过程。

经过这样的抽象性的转化,特殊性为普遍性所遮蔽,阶级性为人类性所遮蔽,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观就幻化成为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观,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利益就幻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某些国家的地方性经验就幻化成为世界性的共同遵循。普世价值论的理论形态得以生成,普世价值论的宣称者拥有了“普世价值”的话语解释权和标准行使权。

“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就是普世价值论的典型代表。它们把历史上特别是当今世界中内含着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实体、不同国家利益的争端和冲突,进行“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化”之后,归结为“争取认可”的斗争<sup>[9]</sup>,从而把阶级斗争、政治冲突、意识形态交锋,抽象成为“学术性”话题,概括成为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文明形态的冲突。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长期追逐的“争取认可”的斗争已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因为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代表了人类文化价值观发展的顶峰,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模式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顶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只要以此为标准,向着这个顶峰发展就行了。这种观点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和主张,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当年马克思批判过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庸俗经济学,也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永恒化、理想化的理论形态。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这个理论逻辑的层面。当这种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观点同某些国家政治霸权主义实践结合起来之后,其内在的政治意向性就突显出来,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一种具有浓厚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一方面,它把某些西方国家提升成为共同价值理想的代表,把它们在全世界所推行的文化渗透、政治霸权和经济侵略,幻化成为共同价值观的建构、先进政治理念的推行、合理政治制度的普及,使这些霸权国家通过这个理论的幻象似乎站到了人类道义和理想的制高点上。另一方面,它把西方某些国家的具体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永恒化、标准化,确立为道义的、价值的、政治的评判标杆,使西方某些国家获得了道德上、价值上、理论上的当然优势,成为掌握着标准评判权的先验性的裁判官,对其他国家、地区的自由、民主、人权、进步状况,以及这些国家地区根据自己国情状况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指手画脚并横加干涉,而且声称自己是为了谋求所谓的文明进步,是为了实现多元化、民主化、自由化的社会建构和世界秩序。

普世价值论的实践性展开,首先是某些西方国

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行渗透到世界各地,掀起了全球性的文化齐一性、同质化,有针对性地一些国家和地区培植普世价值论的追随者、宣扬者和践行者。之后,依靠这些被普世价值论化了的本土力量,或者自己直接出动军事力量,对受渗透国家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社会结构进行重建和调整,中断这些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进程,导致长期动荡不安,人民失去了基本的人权、自由和民主,距离普世价值论者所宣称的目标越来越远。再进一步,被渗透国家在制度改造和政权颠覆之后,沦为改造者的控制对象,被改造者的经济发展完全被操控,它们的各种资源、经济利益等成为改造者肆意攫取的对象。因此,被宣称的“普世价值”只是形式和伪装,所谓的民主化、自由化只是旗号,文化渗透也不是最终目的,资本主义化也只是其他地区和国家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化,最终的目的的是经济资源的占有和经济利益的攫取。

其实,普世价值论并不是一个新东西。马尔库塞曾用“否定性”文化向“肯定性”文化的转变来概括和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进程。他指出,资产阶级文化曾经起着很重要的革命性作用,具有否定性的特点,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稳定后,就愈发效力于压抑不满之大众,愈发效力于纯为自我安慰式的满足。它们隐藏着对个体的身心残害”<sup>[10]</sup>,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对现实进行粉饰和维护,“对既定秩序起着巩固而不是否定的作用。”<sup>[11]</sup>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正义等一系列同封建专制文化相对立的先进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用以号召和动员本阶级及其联盟者,联合起来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在其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就进一步把本阶级的价值追求幻化为永恒的、最高的、全人类价值追求,用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打击落后阶级的反弹,压制更先进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更先进的文化意识形态。这实际上就是普世价值论的早期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这种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论进行过深刻批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和人权,实际上就是私有财产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sup>[12]</sup>,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平等、安全等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对象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庸俗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永恒论系统化了,成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

的学说,成为论证永恒性的理论,“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sup>[13]</sup>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论证统治阶级永恒性、持久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总是“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他们所宣称的永恒正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sup>[14]</sup>。

当代的普世价值论是历史上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论的延续,同时又与当代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理论样态和表现形式。它把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宪政思想、民主模式、人权观念、现代化经验、国家治理理念,泛化为全世界必须共同遵循的原则,以“人权高于主权”、“意识形态终结”、“结束冷战”、“文明的冲突”、“自由民主至上”等为旗号,掩饰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利益攫取的目的,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进程。

由此看来,普世价值论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价值理念,更不是什么全人类共同价值理想的理论表达。在其本质上,它是一种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和霸权主义掩饰、服务和辩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以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来观照这种意识形态就会发现:它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缺乏对历史的科学性把握,是一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最终为资产阶级攫取经济利益服务,根本不是什么全人类性的价值理念;以推广和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张目,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经济和军事侵略辩护,是一种庸俗而反动的辩护性价值理论。

我们必须认清普世价值论的表面伪装,揭露其深层动机和目的,抵御其实施的过程,防止造成的恶果。一些被渗透国家的政府和学者渴望通过普世价值论者的承诺来发展自己,只是一种单相思式的幻想。对此,毛泽东早已根据中国近代史的惨痛经历得出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结论<sup>[15]</sup>,这个结论对于这些幻想者永远是一剂良药,对那些不遗余力地宣扬普世价值论的人则无疑是一击猛拳。

#### 四、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及其危害

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论进入中国思想界之后被某些人所接受和推广,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形成了特有的“中

国化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领域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第一种形态是恶意误读。用普世价值论来恶意误读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国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之时,中国人以自信开放的心态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口号,一些人故意误读这个口号,说是这表明中国人真正开始融入世界文明之中;与此同时,一些人把汶川赈灾同普世价值问题联系起来,炒作起普世价值论。围绕着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一些人恶意误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发展,说成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sup>[16]</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汲取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有人又断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走向普世价值的重大步骤”。十八大以后,围绕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和方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又有人断言中国“越来越接近普世的治理模式”,是“真正迈向现代人类文明”。不久前,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的概念之后,又有人歪曲地认为中共领导人开始接纳“普世价值论”了<sup>[17-18]</sup>。

第二种形态是恶意攻击。一些人抱着反动的政治动机,把普世价值论工具化,恶意攻击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以所谓的多元化、民主化等为判据,批判、否定、攻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企图以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多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多元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sup>[19]</sup>。例如,他们攻击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是撇开普世民主、拒绝英美民主、自己另搞一套,“就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他们不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做文章,而且已经把触角伸向了经济基础领域。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说三道四,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把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方案”,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落后于并必须走向美国式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方案”<sup>[20-21]</sup>。他们提出,中国三十年多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的提升,“主要靠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得多”,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方

面,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动大手术而不是轻描淡写,应该学习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的改革经验,把“国企占 GDP 比重要降至 10% 以下”<sup>[22]</sup>。

第三种形态是恶意放大矛盾、制造事端。一些人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故意放大和歪曲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把一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把某些地方发生的具体问题说成是“压制民主”、“限制自由”、“剥夺人权”,挑起群体性事件,发酵和激化社会矛盾。当年,中国人民在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时候,有些西方媒体却把这件事同中国的人权、中国的制度设计、中国对生命的态度等联系起来,好像“非典”暴露了中国主流价值观存在的严重缺陷。一些人同国外势力相勾结,恶意评价和干涉中国内部事件,为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暴行张胆辩护,制造政治冲突和民族分裂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稳定。一些人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实践,把某些反政府人士和力量说成是“民主力量”,给中国政府施压,要求解除对某些反面人士管制,并同西方国家操控的某些国际机构合作给这些人士授奖,毁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些人以普世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所谓的“宪章”和“政纲”,并发动所谓的签名活动,从而使政治化了的普世价值论思潮进一步抬升为一种反动的政治实践。

可见,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已经演变成为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政治化思潮,这种思潮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当今时代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这种反动的政治思潮及其实践性转化,决不能搞庸俗宽容论,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批判和切实有效的制裁。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富有成效的历史经验是需要坚守和发扬的。20 世纪 50 年代,面临某些反动政治思潮的猖狂进攻,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当然,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为此,他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集体意志,根据中国的宪法原则,提出了判断思想政治领域的六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sup>[23]</sup>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针对思想领域的涣散软弱状况,他指出:“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sup>[24]</sup> 改革开放进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严重冲击了四项基本原则,为此他又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sup>[25]</sup>。结合当今普世价值论的蔓延及其政治化实践的情况,可以看出邓小平这些话在当今不仅不过时,而且非常具有时效性。

在看到普世价值论的实质和危害之后,我们还必须要深思一个问题:普世价值论思潮作为一种非本土的思潮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自从出现之后虽然遭遇了来自政治上层和主流学者的长期批判,不仅没有彻底消除而且有“长盛不衰”的迹象?

很多学者从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的角度来追索,认为它不是本土的思潮,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因而应该加大意识形态防御的力度,阻止这种外来的政治思潮的蔓延和冲击。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依然是两大制度并存的时代,“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国际的阶级斗争和制度交锋始终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冲击非常严重,某些西方势力一直在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普世价值论的渗透就是其中的重要体现。

但是,问题绝不仅是外来渗透这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应该是在国内,如果内部没有普世价值论存在和发酵的土壤,这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决不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为此,我们必须检视内部因素,把关注和分析这些内部要素作为批判和清理普世价值论的重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和深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转型,转型期的社会成员分层化和思想文化多样化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我们在急遽变动的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把握好文化发展上的“一元多样”性,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地位同各种多样化思潮的并存关系,在多样化中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第二,从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来看,我们在推进对外开放之初曾经提出,开放的同时必须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但是,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全面开放”成为一种共识。那么我们必须反思:开放的全面性究竟应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文化的开放特别是政治性文化的开放有没有一个限度? 面对西方



意识形态渗透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局面,我们应该明白:对外开放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应该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牢记邓小平讲过的,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动摇。

第三,从当代中国经济基础来看,经济成分的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每一种经济成分及其代表都必然会有其思想上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不仅要发出经济上的声音,同时也要提出政治上的诉求;当这种诉求同国际资本代言人的思想观点获得一致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就获得了落地生根乃至发酵蔓延的机会。某些所谓的“公知”、“大V”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沦落为西方资本和政治势力的国内代言人;而另外一些人则完全站在某些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以普世价值论为工具公然站在了党和国家的对立面,成为地道的“砸锅党”。

第四,从思想理论界的现状来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干部,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淡漠甚至放弃了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等基本方法,不能认清普世价值论的阶级实质和政治倾向性,仅仅把它看作是一般性的学术思潮;不能辩证地看待对外开放,把西方的一切都看作是学习的需要,在全面开放中丧失了理论定力,丧失了理论道路制度自信。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完全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圭臬,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在外来意识形态渗透面前,缺乏足够的理论清醒和思想鉴别能力。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26.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405-406.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48.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6.
- [6]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

- 版社,2009:158.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3.
- [9] 弗兰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许铭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10] 赫伯特·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 李小兵,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124.
- [11]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面人:发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左晓斯,张宜生,肖滨,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50.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8-99.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
- [1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 [16] 党国英. 立足民族特色拥抱普世价值[N]. 南方周末,2007-10-25.
- [17] 刘庆丰. 对近年来国内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研究的述评[J].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1(1):342-349.
- [18] 汪亭友. “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J]. 红旗文稿,2016(4):8-10.
- [19] 杜光. 普世价值: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J]. 炎黄春秋,2009(1):4-7.
- [20] 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朱学勤访谈录(上)[N]. 南方都市报,2007-12-30.
- [21] 北大称要严肃处理反社会主义言行:指向贺卫方?[DB/OL]. [2015-2-4]. <http://www.wyzxwk.com/Article/yulun/2015/02/338193.html>.
- [22] 张维迎. 改革领导小组值得期待[N]. 新京报,2013-11-15.
- [23]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2-234.
- [2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3,390.
- [2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6,379.